责任编辑：戴菁　E-mail:daijing314@163.com　电话：010-62805132　　2013年11月11日

《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主要特点及亮点

编者按：中共中央近日印发的《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颁布实施的第六个规划，并且在十八大召开之后随即推出，在党的干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作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部署，对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那么这部《规划》有哪些新的特点与亮点，对干部教育培训提出了哪些新的指导要求？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贯彻《规划》的精神，我们请相关人士对《规划》做了解读。

□熊　云

颁布《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召开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是今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两件大事。共同的目的，是对今后五年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出安排部署。这个《规划》，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颁布实施的第六个规划，在党的干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的主要特点

与以往的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比较，这个《规划》主要有以下5个特点。

1.紧贴党的代表大会。以往的几个规划，几乎都是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同步（第一个规划除外，它在1983年颁布，紧贴党的十二大）。这个规划改为与党的代表大会同步，在十八大召开之后随即推出。主要考虑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要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而党的代表大会则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所作的全面部署，以党的代表大会为节点，来谋划部署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更有利于落实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更有利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2.突出两个服务。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为培养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服务，是我国干部教育培训的根本目的。《规划》多处体现了这一思想。比如，《规划》制定的目的就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规划》第一条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干部履职尽责和健康成长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规划提出今后五年教育培训的目标是，“使广大干部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理论素养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切实增强、工作作风明显改进、德才素质和履职能力显著提升，使干部教育培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

3.更加重视质量。以往的干部教育培训规划都很重视培训质量。这个《规划》把培训质量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鲜明地提出“全面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量”，“坚持质量第一、注重实效”，并把“质量要求”单列一条，用较大篇幅加以阐明。《规划》全文出现“质量”一词的地方多达13处。之所以这样重视培训质量，是因为大规模培训干部十年来，培训数量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但培训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据问卷调查，当前干部教育培训存在的突出问题中，课程设置针对性不强、培训方式方法缺乏吸引力感染力等质量问题位居前列。许多地方花高价请优质师资，或组织干部到著名学府培训，体现了对优质培训的迫切期盼。《规划》顺应了这一期盼。

4.强调从严教育。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贯彻落实这一方针，必须把从严教育贯穿始终，做到从严治学、从严治教、从严治校。《规划》多处体现了这一要求。比如，在培训内容部分，提出要教育引导干部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增强辨别大是大非问题的本领；坚决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增强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牢记“两个务必”，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切实做到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在培训能力建设部分，把学风建设单列一条，突出强调“三从严”。

5.体现良好作风。代拟单位在文件起草前组织了广泛深入调研，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请有关专家对重大政策措施进行论证。这使得《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措施等符合实际，大大增强了指导性和可行性。比如，以往有关文件规定，县处级及以上党政干部每5年必须参加3个月以上的脱产培训。经调研了解，大部分干部达不到这个要求。《规划》充分考虑这一现实，提出将干部选学、单位组织的专题讲座甚至网络培训的时间，计入脱产培训学时。同时，为避免以网络培训取代脱产培训，又进一步规定计入脱产培训的时间不超过总学时的40%。再如，《规划》对由中央及有关部委直接抓的培训，一般都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而对由地方特别是市、县两级抓的基层干部培训，只提原则性要求，没有提具体任务。又如，《规划》要求中央组织部对规划实施情况开展中期和5年总结评估工作，要求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每年对本地区本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进行检查评估。

《规划》的突出亮点

《规划》坚持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优良传统，同时又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任务、新举措。

1.把指导思想从“两大”拓展到“两全”。“两大”，即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两全”，即全面深化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全面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量。从“两大”拓展到“两全”，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过去10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主要是落实中央提出的“两大”。今后5年，不但要继续落实“两大”，还要落实“两全”。把“两大”与“两全”结合起来，主要考虑是：10年来大规模培训干部的做法，实践证明效果是明显的，广大干部是欢迎的，有必要坚持。同时，大规模培训干部中也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有些干部长期没有机会参加脱产培训，有些课程设置针对性不强，有些培训缺乏吸引力感染力，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根本途径是改革创新。

2.首次提出数量指标。《规划》设置了“干部脱产培训量化指标”和“党政干部网络培训量化指标”，这是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首次设置数量指标。其目的在于，督促组织人事部门和干部所在单位科学制订培训计划，创造培训条件，切实保证干部参加教育培训的权利；更好地发挥网络培训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作用。组织人事部门和干部所在单位只要严格按照指标要求，统筹制定培训计划，并抓好组织实施，可确保绝大多数干部5年内完成相应的脱产培训学时任务。对于个别可能“漏训”的干部，再辅之以点名调训等办法，可实现全员培训目标。

3.突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培训。《规划》强调，“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培训”，并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凸显出来，这与之前的规划把它与其他内容放在一起来论述是不同的。其目的在于通过强化学习培训，教育引导干部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根扎在哪里，深化认识，坚定信念，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学习培训。《规划》鲜明地提出，“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为首要任务”，要求组织广大干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起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是十八大精神的深化和拓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通过学习培训，目的在于教育引导干部知道我们去哪里、怎么去，振奋精神，奋发进取，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5.充实完善了党性教育的具体内容。《规划》把党性教育的具体内容梳理为7个方面：党章，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作风，反腐倡廉，党史国史特别是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创业史、改革开放史，世情国情党情。这在中央印发的文件中还是第一次，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党性教育的认识，必将有力地促进党性教育的深入开展。

6.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规划》把它单独作一板块加以论述，目的是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使之成为广大干部的内在精神信仰、基本价值追求和行动准则，引导广大干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记责任、敢于担当、勇于开拓创新，自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和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7.紧紧围绕“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开展能力培训。党的十八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规划》提出了相应的五个方面能力培训的内容，这是干部教育培训服务中心工作的具体体现。今后一段时期，开展能力培训就要紧紧围绕这五个方面来设计和实施。当然，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是对干部队伍整体而言的，具体到某类干部，还要根据岗位特点和需求，各有侧重地开展培训。

8.突出重点对象。《规划》坚持全员培训，同时又突出重点对象，把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和中青年干部作为今后5年教育培训的重点对象，这既坚持了以往做法，又赋予一定新意。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党的执政骨干，历来是干部教育培训的重点对象，但过去在表述这一重点对象时，提法通常是领导干部或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它既包括了领导班子成员，又包括了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干部。《规划》的这一表述，无疑更具象、更聚焦、更好把握。中青年干部，是党的战略后备力量，是干部教育培训的又一重点对象，过去在表述上通常是年轻干部或后备干部，在培训实践中既不完全是年轻干部，也不完全是后备干部，还包括了部分中年干部和非后备干部。《规划》作如此表述，更准确、更贴近实际。为了抓好重点对象的培训，《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措施，如：每年安排500名左右县委书记到中国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进行党性教育；全员开展科学发展能力培训；开展应急管理能力培训；安排部分中西部地区的中青年干部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培训；积极开展优秀中青年干部个性化定制培训等。这些措施必将有力有效地推动重点对象培训。

9.重视薄弱环节。《规划》把机关内设机构公务员和基层干部作为薄弱环节来抓，要求加强对他们的培训。机关内设机构公务员包括中央、省（区、市）、市（地、州、盟）三级中国共产党、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检察、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等8大系统机关中，不由上级或同级组织部门管理，而是由本机关人事部门管理的干部。这部分干部规模大、分布广、职责重，过去5年中有29.21%的没有参加过脱产培训，在党政干部中占比最高。因此，《规划》将他们作为培训的一个薄弱环节。考虑到这部分干部的培训主要由本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安排，《规划》主要是提原则性要求，只对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司局级干部作出了具体的培训安排。基层干部包括县（市、区、旗）直属部门机关干部，乡镇（街道）干部，县域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村（社区）主要负责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负责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等。初步估算，全国的基层干部大约627万名。培训机会偏少，优质培训资源不足，培训经费得不到保障等，是基层干部教育培训面临的突出问题。《规划》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高度重视，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

10.首次提出培训能力建设要求。《规划》将办学体制改革、运行机制改革、内容方式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经费保障、学风建设、理论研究整合在一起，名之曰“培训能力建设”，这在中央印发的文件中尚属首次。这部分实质上是讲干部教育培训的自身建设，它按照时序进度，将《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提出的任务措施进一步细化，同时又根据新情况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比如，在办学体制改革部分，提出了加强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建设，鼓励部门、行业培训机构合作办学，发挥现有干部教育培训基地的作用，改进境外培训工作等。在运行机制改革部分，进一步明确了培训计划生成机制、参训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健全的时间节点。在内容方式改革部分，提出组织编写第四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加大案例教学比重等。在师资队伍建设部分，提出加强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师资队伍建设，5年内将市县两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师轮训一遍，2015年前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等。在理论研究部分，提出建立理论研究交流平台，推动干部教育学学科建设，等等。

从战略高度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郭　威

风险是现代社会的常态，是不可避免的时代境遇，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合法政党，必须不断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当前面临风险的主要特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相比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风险更加具有多样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风险等类型都会产生，而且数量更多，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一是从风险的源头看，具有发展阶段的叠加性。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脱胎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母体，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适逢发达国家带动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近年又遇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这五个历史过程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风险往往会出现封建性、计划性、资本性和后现代化的混合叠加，前现代化、中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三个发展阶段特征的叠加，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转型社会的三个发展形态的叠加。二是从风险产生的主客观关系看，具有主观内生性和客观外生性特点。任何问题的产生都有主客观原因，从风险的成因看，主观原因是内生性风险，是因党自身问题而引起的风险，客观原因是外生的，是由党和国家外部因素而引起的风险。党强则国盛，只要党自身肌体健康、足够强大，就可以化解各种风险，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国际领域的风险。三是从风险压力结构看，“五位一体”的供给和需求非均衡进展，非经济风险压力增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状况看，我们“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间，总体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走在前面，其他方面的建设滞后于社会公众发展需求。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和创造机会，合理引导、理性处理这些多样性的需求，这种供给结构和社会多元化需求结构的非均衡状态长期持续，得不到满足的需求长期积淀下去，很容易转化为非理性追求，进而衍生为与现行法律、政策等相违背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成为危及社会安定和执政地位的风险。

提高抵御风险能力的建议

要从全局和整体布局风险的应对，防止出现战略风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运行机制决定了，基本方针路线等宏观战略决策，是统领各种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的指挥棒。我国任何一个政府制定与执行政策的具体行为所产生的风险，都是政府总体战略决策风险的一部分。如果政府总体战略是高风险战略，那么，任何把这个总体战略具体化、可操作化、政策化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行为，也必然是高风险的。因而，在社会转型期，我国防范、应对各种执政风险的制度和政策，一定要和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做到步调一致、统筹解决。

建立国家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提升党和国家的数字化管理能力。相比较世界主要国家而言，我国的数字化风险管理体系尚未形成，一些决策是基于以往经验和事后问题应对，颇显陈旧和被动。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专设或者民间机构，提供国家风险评级指数，运用不同的方法把特定国家一系列定性和定量的信息整合为一个单独的指标以反映国家风险的高低，同时，部分机构专门对国家风险类型进行评级，如信用风险、经济风险和汇率风险、政治风险和腐败风险等。我国应当借鉴国际上通行的方法，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构建风险的评估指标体系，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为国家战略和风险应对提供理性判断的依据。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政治伦理的当代诠释

□朱辉宇

10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伦理学会政治伦理学分会、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省伦理学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次全国政治伦理学研讨会在太原召开。中国伦理学会政治伦理学分会会长、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韩庆祥教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教授，山西大学副校长高策教授出席大会并致辞。本届会议围绕“十八大精神与政治文明”这一主题，具体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在此过程中，政治伦理学如何确立自身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

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从“经济问题哲学分析”“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思路入手，重点解析了中国的社会层级结构，系统阐明了政治伦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提出，政治、经济、社会三大力量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而以权力层级结构为核心的传统社会造就了诸多“中国问题”。我们必须推动“权力社会”向“能力社会”转变，强调分配的正义性和道义性，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调结构”“转职能”“保服务”之上。中央党校董振华教授从马克思坚持人民立场的角度，阐释了政治家的价值追求、政治运行与政治伦理的内在联系。他用马克思以“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作为择业目标为例，阐释了马克思倾注毕生精力实践这一理想的过程，并再次重申“坚持人民群众的立场和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山西大学薛勇民教授强调，经济、政治、伦理三者之间应该也能够实现有机契合，并认为它们都是拉动社会发展的力量。由此，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伦理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

政治伦理与政治文明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行了战略性部署。就此，与会专家们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对政治文明建设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山西大学乔瑞金教授提出，文明建设说到底是关于人和为了人的活动，政治文明建设说到底是关于推进人的解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认真考虑个人的存在意义和特征是一个核心问题。英国近代早期个人主义的政治理念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可资借鉴的经验和事实，并启示我们：回到真实的个人基础，结合中国现实，在共产主义的高度，立足人的全面解放的精神，是政治文明建设所必需的。苏州大学于树贵教授提出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类型问题，指出传统政治伦理具有三种正义类型，即信仰型、权利型、责任型。在当前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倡导和维护责任型正义，以此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之路。

政治伦理与制度建设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是抓好当前各项工作的根本问题。立足政治伦理学的研究视角，如何设计和推进制度建设是广大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央党校靳凤林教授从社会阶层分析入手，提出通过民主政治制度伦理建设制衡公共权力，通过市场经济制度伦理建设规范资本运营，通过社会建设保障劳动阶层利益，进而达到三个目标，即实现各阶层所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一致，促进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推动国家、市场、社会在动态平衡中发展。云南省委党校李晓南教授提出，制度建设既要体现价值追求，更要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当前，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实践基础上的制度创新已成为制度建设的关键与核心。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运动决定了改革创新的必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出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契机；社会基础秩序的维系与稳定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中央党校杨信礼教授阐明了制度建设与核心价值观之间高度的契合关系，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强调了核心价值观的激励功能。

政治伦理的其他问题

政治伦理学研究涉及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与会专家们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官德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程建江教授主张，要增进社会成员对社会形态的认同，需要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处理好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与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中央党校刘余莉教授从《群书治要》研究出发，联系现实的反腐倡廉问题，对“能”与“德”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述。她提出，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能人现象”，人们往往过于注重人的能力而忽视了人的德性，给社会进步造成了巨大伤害。事实上，不论是社会发展还是个人进步，都必须同时关注并具备“能”与“德”两个方面。内蒙古师范大学麻海山教授，重点探析了现代性“罪”之源，分析了现代性危机的本质与发展趋势。山西大学焦秀萍博士提出，韩非子以“不两立”的视角透视人性、社会现象及政治局势，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务力”，即增加国家的综合实力，是解决“不两立”的途径，是治国的根本。这种现实主义的哲学理路，在今天的政治伦理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哲学部）

会议综述